

浅谈郑观应《盛世危言》中的社会改革措施

徐可纯

自鸦片战争以来,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下的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从龚自珍、魏源开始一批先进的思想家批判了封建旧制度的种种腐朽、不合理的现象,在主张抵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同时,又主张吸取西方的文明,他们提出了变法的主张。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中法战争的失败,使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对清政府的洋务运动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他们从洋务派集团中分化出来对洋务活动进行批评和抨击,进一步提出了改革的要求,郑观应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郑观应,出身于太古轮船公司的买办,后参加李鸿章洋务集团,经办过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织布局等企业。郑观应的代表作《盛世危言》是由他的早期著作《救时揭要》和《易言》发展而来,于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初刊。这本书可以说是郑观应改革的理论著作,全面体现了他的思想精髓。郑观应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涉及各个方面并构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其主要内容可分为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

一、在政治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设立议院。

中法战争以后的知识分子开始从洋务自强的幻梦中逐渐清醒过来,为什么洋务派的措施并不能使中国富强?中国怎样才能强大?对于这些问题很多知识分子进一步思考的结果就是冲出洋务派的牢笼,走向其对立面。郑观应也是其中之一,他说:“六十年来,外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而

见本源,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他认为西方国家的“君民共主”的议会政治才是治国的根本,变法的纲领。只有抓住这个根本的纲领才能推动一切改革而使中国走向富强。“中华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欲张国是,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把自己的主张切实落实到仿效资产阶级议会政治上,这是郑观应超出把船坚炮利作为富强手段的洋务派的地方。

那么这种“君民共主”究竟是怎样一种政治制度呢?郑观应倾向于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而美国、法国那样的民主共和政体是不能接受的。他认为民主共和,“权偏于下”,会导致政治上的分裂与混乱,对于这种并不要求抛弃皇帝而是希望建立对皇权产生限制作用的君主立宪的议会制度,有人评价为郑观应等一批早期改良主义者的目的和他们的封建前辈是一样的,在社会矛盾激化、统治充满危机的时候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以缓和阶级矛盾,不同的是改良主义者提出的措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议会政治。他们的主观愿望在于给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修缺补漏,以使君主统治长治久安。

我认为这样的评价不完全恰当,首先,这种限制削弱君主权力的议会制度在当时的提出,它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虽然他们提出的这种议会制度相对比较保守,但如果我们从当时

的历史和社会客观实际来考察它的作用,则可以认为是迈向民主道路上的一个相当大的进步。因为19世纪后半期清王朝还是封建的经济占绝对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则刚刚诞生,其力量相当微弱。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在于是否有人敢于提出实行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而不在于这种民主政治形式是否先进或者落后,也就是说对于西方文明成果的引进,首先是一个接不接纳的问题,然后才能考虑接纳程度的深浅,这是一个质变和量变的问题。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或事件时,不能以现代人的观点去苛责前人。其次,郑观应等早期改良主义者虽然在理论上超出以往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洋务派的地方,提出政治上的民主改革,但和以往的一切改革家一样,他们同样要面临一个传统文化压力的问题。中国是一个长期闭关自守的大国,有自己固有的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文化压力下,任何一个提出引进西方文明的人,必须同时回答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西方文明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无法立足。只有协调好二者的关系,先进的文明才能为古老的传统所接纳。由此,“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论应运而生,那么这种“君民共主”实际上还是“中体西用”主张的延伸。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表面上早期改良主义者声称封建制度本身是好的,只是由于某些外在因素才造成君民隔阂的状态,只要进行某些改革就可以去掉这些因素,因而极力论证自己的“君民共主”的主张不仅不会削弱君权,而且还是消除君民隔阂的好办法,可以使君主统治长治久安,而且无悖于传统上君臣之义的教导,由此达到将西方的民主制度引进中国(这才是最根本的结果),他们以承认传统为先决条件,换取国人对西方文明的接纳。这可以说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重要的在于结果。

所以,这种“君民共主”的政治理论的提出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它毕竟在民主的道路上跨进了一大步。这种理论一出现,不可避免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传播扩散,最后导致对封建制度的否定。这可以说是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巨大功绩。

二、经济上提出商战思想,认为“商”是富国强兵的另一个关键。

郑观应长期从事洋务实业活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有一定的认识,因而提出“商战

重于兵战”,把抵抗外国经济侵略放在抵抗外国军事侵略之上,说:“彼之谋我,噬膏血非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迨至精华销竭,已成枯腊,则举之如发蒙耳!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厌欲,孰得而谁之哉!”所以要想真正富强,必须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列强。他的商战思想有这样几个特点:

1. 提出“以工翼商”。他认为商业和工业是密不可分的,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保证。所以他说:“西人之富,在工不在商。盖商者运已成之货,工者造未成之货,粗者使精,贱者使贵,朽废者使有用,有工艺然后有货物,有货物然后有商贾耳。”这说明他的注意力转向生产领域,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逐渐加深。

2. 提出“以政佐商”。他将政治和实业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的观点,并指出政治不改良,资本主义工商业很难兴盛。这说明他已经认识到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因而开始提出政治上的民主改革,鼓吹“君民共主”的议会政治。

3. 主张按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办企业,反对官办和官督商办。郑观应作为李鸿章洋务集团的一分子,长期从事兴办官办、官督商办等洋务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这种企业内部人员冗杂,名目繁多,“其中浮支冒领供挥霍者不少,肥私囊者尤多……今欲扩充商务,当力矫其弊,不用官办而用商办。”只有完全商办,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商人才能尽量降低成本,加速资金周转速度,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由“官办者终鲜获利”。

郑观应的这种“商战”思想总结起来就是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本国经济,同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经济竞争。这种思想包含着抵御外侮的积极意义,是爱国的,进步的,是值得肯定的。

总之,郑观应作为一个早期改良主义者,他把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措施和富强救国的目的结合在一起,尽管他的思想拘于时代的限制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但在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方面,确实起到了一个启蒙的作用。

(责任编辑 阎正富)